



我在西南联大接触的一个中共地下组织——“文化小组”

○吴大年（1945届历史）



吴大年学长

吴大年，1925年生于北京，祖籍上海嘉定。1945年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附中、西南联大附中、昆明师院附中。1950年后，先后在金坛县中学、常州师范学校、扬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1956年后，调至江苏省高教厅、江苏省教育厅，长期在教育行政部门任职。1985年底离休，参与《江苏省志·教育志》编纂工作，任编委。从事教育事业五十余年。

一、茶馆谈话

1944年，19岁的我正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读三年级，其时全国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剧变，政治空气沉寂已久的联大校园也变得越来越不平静。这年3月，国民政府因畏惧青年学生的五四革命精神，宣布将黄花岗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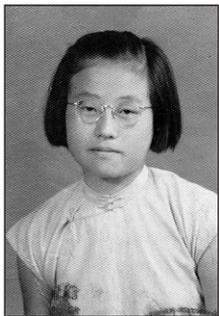
纪念日（3月29日）改定为青年节，同学们闻讯后极其愤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在地下党的授意下，联大历史学会于5月3日晚在新校舍南区10号大教室举办五四座谈会。大教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气氛空前热烈。

5月8日晚，中文系又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举办文艺晚会，这是联大师生第一次在这块草坪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到会人数约3000人，除联大师生外，一些外校学生和昆明市民也赶来参加。此间，联大新校舍民主墙的壁报也活跃起来，每天课前课后总是观者如潮。纪念活动整整持续了一周，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些活动，深受教育和鼓舞，也更加激发了我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的热情。

联大五四纪念周活动揭开了新的民主运动高潮的序幕，此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呈不断高涨之势。而这一序幕发端于联大并非偶然。战时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三校“五四”“一二·九”爱国运动的传统，这是吸引全国青年学子前来就读的重要因素之一。

学生们多数来自沦陷区，亲身感受到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其中又有一些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人数虽少，且处于隐蔽状态，却是这一爱国群体的核心力量。

1944年秋，我加入了女同学中的一个



西南联大时留影
吴大年学长十六岁考入

秘密读书小组，这时，地下党油印的《新华社通讯》等刊物开始在女同学中传看，我从进步同学陈雪君手里得到这些刊物，常和她、马岱华等同学在宿舍或新校舍后面的小虹山上阅读讨论。然而我更希望能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但是，我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呢？

1945年3月，陈雪君突然通知我说校外有几位“先生”要约我谈话，时间定在3月8日下午，地点在文林街的一家茶馆。文林街即西南联大女生宿舍所在的这条街，当年开有几家茶馆，来客几乎全是联大学生。同学们喜欢在这儿看书，又能泡上一杯茶，是可以替代图书馆的好地方，一些进步同学选择茶馆“碰头”“交友”，讨论工作，有时还打打扑克作为掩护。我对这次“茶馆谈话”的重要性当然心知肚明，心情既激动又紧张。

那天下午，我随雪君如约来到这家茶馆，但见临街一张方桌边已经坐着三个人，他们见我们进来都站了起来。三位先生年龄均在30岁上下，都是高个子，其中一位身高接近一米九，戴深度近视眼镜，神情严肃；第二位身材消瘦，两眼透露着睿智和深沉；第三位显得敦厚斯文，也戴着眼镜。

从外貌和气质似能看出，他们和我平

时相处的那些同学大不一样，显得稳重老练得多。经雪君介绍，这三位先生分别是王时风、钱闻和王士新。我很拘谨、腼腆地傍着雪君坐下。记得那天谈话的气氛非常严肃，主谈者是王时风，他问我一些理论或时政方面的问题时就像老师面试学生一样。虽然我要求进步的热情很高，但毕竟理论书籍看得少，回答问题也显得紧张和幼稚。

谈话最终以时风同志提出要借给我一些书籍结束。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特殊环境下和地下党接触的难忘经历，也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四年时间里，我的命运便紧紧地和地下党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在其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愿望，并对这几位地下党员的活动情况及工作特点间接或直接地有所了解。

二、小组成员

那天“茶馆谈话”时所见王时风等三人，是1944年秋在昆明新组建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化小组”的成员，除这三人外，其成员还有李南江和汤德明。有趣的是，我后来还惊异地发现，李南江竟是早在六年前我即已熟识并称之为“南江先生”的一位“大朋友”。这要从我八年前那次难忘的逃难经历说起。

1937年夏，我小学毕业，时逢全国抗战爆发。我随外祖父母、母亲等一家九口人于当年8月离开岌岌可危的南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途经苏、皖、赣、鄂、湘、贵等省，历时9个多月，终于在1938年5月到达昆明。沿途中我们遭遇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盗贼的攻击、崎岖山路的险阻、疾病的袭扰和饥馑的困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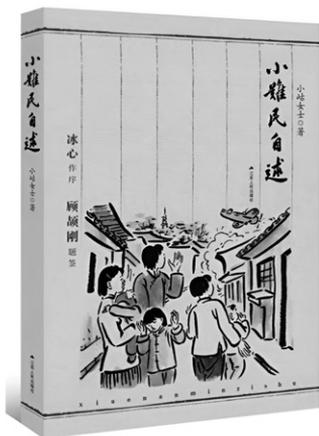
真可谓历经千辛万苦。一路上目睹了被敌机炸毁的城镇废墟，乡村中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和田间面黄肌瘦、牛马般劳作的农夫，还有到处可见的衣衫褴褛的乞丐……那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惨景，给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小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受热爱祖国、仇恨侵略者的爱恨交织心理的驱使，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我决定记下这段经历，用我的笔赞美祖国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同时写出普通中国人面对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和遭受的苦难。抵昆两个月后，我开始动笔，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1939年完稿。当时，为准备升学，我在益世报社办的补习学校上课，正巧报社有两位年轻记者从老师那儿获悉我写书的事后，便找到我家里来采访交谈，这两个记者中有一位便是李南江。他们看了书稿后决定为我联系出版。先是请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作序，后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题写了书名。这本以“小姑”为笔名的《小难民自述》终于在194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正式出版。南江先生当时大约二十四五岁，热情开朗，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他的社交范围很广，不少作家、教授，甚至宗教界人士，他都熟识，只是我的这本小书出版后他却不见了。没想到时隔六七年又在昆明见到了他，原来他在益世报社工作时的真实身份是以记者职业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而我写的这本小书竟得到地下党同志的热心相助，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

文化小组负责人王时风，时为中共南方局派在云南的地下交通员，江苏金坛人，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7年3月加入共产党，其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和王士新、钱闻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钱闻，两人是金坛同乡，少时同在金坛县中读书，上大学后，王去了北京，钱则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每逢假期回乡，两人总是将家乡的年青人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抗战爆发后钱闻奔赴延安，并于1938年初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回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乐山武汉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1940年7月，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武大抓捕进步学生，钱闻险遭逮捕，在群众掩护下转移后辗转来到桂林与王时风会合，并一直在其领导下工作。1944年秋，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败退，两人遂先后离开桂林来到昆明。

自1939年冬至1943年，国民党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党的工作方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再次强调实行这



吴大年所著《小难民自述》

□ 回忆录

一方针的重要性。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党员要在社会上生根、交朋友、学习，巧妙地实施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要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交朋友为中心任务。南方局要求每个党员都要有社会职业，要学好功课或职业技能，以及在条件许可下努力学好时事、政治和党的知识；要精通自己的业务；要广交朋友，深入调查研究。这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即著名的“三勤”政策。

时风等人来昆后，想方设法自谋职业。在当时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的国统区，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钱闻抵昆不久即在昆华高级工业学校谋得国文教员一职，教两个班的国文。后又通过友人林其英在“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国际援华组织）谋得一职，便把昆华工校的一班国文课让给时风，并让出学校一间宿舍，自己住到了“工合”。王士新时任云南纺织厂人事科长，李南江则是南菁中学教员。他们遵照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局面很快便打开了。

三、活动特色

文化小组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是联大的一批进步青年，与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人也联系密切。按分工，钱闻后来与我联系更多些，约谈地点有时在翠湖畔他的“工合”宿舍楼里，有时在他姐姐家或姐夫的教工宿舍。谈话内容主要是介绍理论书籍和分析时政。记得他给我看过的书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



文化小组成员之一钱闻（1946年）

众哲学》、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读完一本书要有心得体会，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再向他们请教。钱闻他们读书很多，知识广博，看问题深刻敏锐。相处熟了，我对他们的感觉早已不限于初识时的严肃认真，更多的是平易温和，亦师亦兄。我从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他们也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被称为“先生”。为了区别两位，我们叫王时风“大王先生”、王士新“二王先生”，那时在联大，老师是被尊称为“先生”的。

随着时局的发展，联大学运开展得很活跃，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我和陈雪君、马岱华、黄惟新等人是最早加入这一秘密组织的一批女生，与文化小组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1945年底，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其间，王时风和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联系频繁。后因运动不断深入扩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省工委急需向上级请示汇报，以便完全理解上级精神，把各种问题处理得当，又派王时风前去重庆向南方局报告请示。这段时间，我和钱闻已在云大附中教书，参加运动情况此处不赘言。

“游击办报”是小组的一项特色工作。所谓“游击”，意指以当时公开出版的多种报纸杂志为阵地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时风、南江和钱闻都是长于这种游击战的“枪手”。我知道时风和钱闻的杂文都写得非常好，文笔锋利辛辣，战斗力强，风格颇似鲁迅杂文。文章常以不同笔名发表在《文汇报》《民主周刊》等刊物上。我曾是联大女同学会壁报《南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常向时风、钱闻约稿，请他们写社论、评论。记得钱闻给我们写过一篇《哭七七》，写得好极了，刊出后很有影响。可惜这些稿件用后即被处理掉，没有保存下来。1946年上半年，地下党组织和民青决定办一份《妇女旬刊》，每十天出一期，当时我已在联大附中教书，组织上通知我参加办刊工作，我也常向时风、钱闻约稿，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再按时到允升家取他们写好的稿子。尤其是钱闻，在《南苑》和《妇女旬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无论是在编辑思想、内容形式还是版面安排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联系联大教授是文化小组工作的重中之重。时风和钱闻与闻一多、吴晗、华罗庚等先生都以“交友”方式有着联系，特别是与华罗庚先生过从甚密。华先生也是金坛人，与时风是表亲，早年在金坛县中时曾是钱闻的数学老师。“一二·九”运动中，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华先生参加示威游行、掩护进步学生，还在假期回乡与钱闻、时风等人一起举办读书会和补习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华先生是个极重乡情友情的人，其时在联大，时风和钱闻便自然成为党组织和华先生的主要联系

人，常到他家与其促膝谈心，谈笑风生。华先生于1946年3月至5月接受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地下党组织对此十分重视。华回国后，钱闻先写了一则短讯发表在6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后又以记者采访形式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的报道，在1946年6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

随后，党组织又安排华罗庚在大操场上公开为广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那特务活动猖獗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华先生勇敢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后又将他写的日记——《访苏三月记》在1947年的《时与文》第14至17期上发表出来。有段时间华先生曾起念去延安，时风以他腿疾不便为由劝他继续搞研究工作，说黑暗总有一天会过去，将来数学对国家会有用的。1946年下半年华先生去了美国，时风仍与他保持通信联系，通报国内时局的变化情况。

文化小组的交友范围还扩展到联大以外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当时昆明知识界和民主人士经常举办一些时事座谈会或专题讨论会，宋云彬先生在1945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记载：

林润青主编之《青年生活》将复刊，特发起在北门书店开一座谈会，时间下午七时，以《中原》第三期所载《方生未死之间》一文为讨论中心，到有曾昭抡、楚图南、光未然、刘执之、李公朴、钱闻及林润青，余亦参加。

参加这类活动是文化小组交友的又一种方式。日记中所记北门书店是李公朴寓居昆明时开在青云街上的一家书店，座谈会讨论的《方生未死之间》，是一篇剖析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症结和探索其历史根源的长达数万字的议论文，在当时国统区知



1986年，吴大年在南通师范举办江苏省第一次中师校长研讨班时，与校长们参加南通师范五年制中师班学生的班会活动“闪光的职业”。此为班会结束前应同学之邀作即席发言

识界引起普遍重视。文章作者于潮，后来才知道就是乔冠华。日记中的曾昭抡、楚图南、光未然、李公朴等人，与王时风和钱闻都熟识。

钱闻还和宋云彬、曹朴（曹伯韩）、孙起孟等人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高中进修国文选》。宋、曹、孙均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先生是著名文史学者、作家、编辑；曹先生是语言学家；孙先生于1945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在昆明创办了进修出版教育社。宋先生1945年3月6日至6月29日的日记中，共有9处记载了与孙、曹、钱商谈编写教科书的原旨、体例、经费出版和分工等事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忙碌的程度及钱闻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中进修国文选》的特色在于不仅重视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而且紧扣时代，突出思想性和政治性，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大胆创新。而教材本身也成为文化小组在国统区贯彻“三勤”政策，与爱国民主人士并肩战斗的一个有力佐证。教材出版后在昆明的中

学、师范学校被广泛使用，影响很大。例如，教材中选用的于潮的议论文《方生未死之间》、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等作品都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对青年学生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和启迪作用。《队长骑马去了》的作者天蓝，原名王名衡，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后到延安并加入共产党。这首长诗创作于延安并广为传诵，后又流传到国统区，被公认为抗战以来的一首好诗。由于这首诗热情歌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一位英雄队长，并控诉杀害英雄的“奸人”，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将这首诗公开选入中学教材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高中进修国文选》不仅选用了，而且还配上钱闻所写的“文话”（课文释义），以其优美壮阔的文字予以深切解读。教材出版后，钱闻在昆明师院附中教高中国文时就使用这本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和朗诵这首诗，使学生们深为感动和振奋。

四、背影远去

1946年7月，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复员北上，大批民主人士也离开昆明，文化小组的使命遂告结束，小组成员分散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勤恳敬业，埋头工作，坦荡淡定地走过几十年风雨路。王时风、王士新和钱闻几位老朋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也未中断。从那时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小组成员多已相继离世。当年，文化小组因处在地下而鲜为人知。正如联大校友，曾任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在其《且说西南联大精神》一文中

谈及联大地下党活动情况时所说：“这似乎是大家介绍西南联大所少提到的，大概由于当时我们处于地下状态，许多情况不为大家所了解之故……”这话我是深能理解并有体会的。

文化小组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前舍身忘我地为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生前都未能留下较完整的回忆文字。回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也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总想着为这些曾在第二条战线上出生入死

战斗过的普通共产党人写下点什么，以使其不为人所知的业绩不至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但囿于我所知不全且浮于表面，以上叙述肯定是不完整的。但我明白，比叙述本身更清楚、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幸福的新中国这样一个艰难、漫长的历程中，这些无名战士的事迹是不该被活着的人们遗忘的。

（摘编自《百岁述往忆杏坛》，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我的人生与奉献之路

○郭 锋



郭锋
学长

我1937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56年随爱人到清华大学工作。先在人事处档案科，后到第一科（学校直属的保密科），于1960年调校长办公室直至1992年退休。曾任校办党支部副书记、秘书科科长。曾获评校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北京市群英会和北京市教育卫生体育等五条战线先进工作者会议，为终身荣誉获得者。退休后这33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发挥余热。本文梳理了我在职以及退休后两个时期的工作，与校友们分享。

一、在职工作：尽心尽责 传承创新 行政管理亦应革新

1959年技术革新，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结合行政机关实际，和教务处一位懂电的同志一起，对处里的手动中文打字机进行了革新，改造成电动打字机，比原来打字机的打字速度提高了3至5倍。我也参加了学校的打字比赛，名列第一。

关心别人从小事做起

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深深感动了我，我决心向他学习，从小事做起。

时任校长蒋南翔同志非常注重群众来信、来访。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群众来信和处理群众来信。有一位从南方考入大学的学生给校长写信，反映没有厚棉被，多次感冒、发烧，影响了学习。当时已到冬季，天气很冷。校长看信后批示：“此关系到学生健康，立办”。我立即找相关系负责人，审核批准给予经费补助。不过